

# 回应时代演变中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 程伟礼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性这一重要因素。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必须回答时代演变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代性问题导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回应时代演变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的。

## “重塑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

一定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新时代课题就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他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事实上,导致难民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

但现实情况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反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从理论上考察,反全球化呼声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后全球化”的观点。主要认为,全球化正在逼近其自身的限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生产方式由资本空间向非资本空间扩展,总有一天会达到自身的限度。二是“新全球化”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百年全球化之所以造成民族主义出现,恰恰是一直以狭隘国家主义为目的,掠夺、霸占、独占、转嫁危机为手段,以倡导全球价值和文明为口号掩盖狭隘民族主义的用心。

目前,“重塑全球化”认知已经成为世界上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知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是《世界新趋势》,副标题则为“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它就新新在从传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到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内涵的新全球化成为新的世界重塑力量;新就新在以新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实体配置;新就新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活跃的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新就新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用和平、分享的方式带动社会繁荣及互利共赢和利权和主权的全球合作治理。

无论是“后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都承认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广度上的增加、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深化,其中包括人类组织的变化或变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全球化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

针对新时代的“重塑全球化”使命,中国人的对策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构想和战略构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下,人们必须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

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还是让不少人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回答相关问题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他进一步强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导人们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就能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五个“坚持”的行动方案。在伙伴关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格局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 development 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五个“坚持”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这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所谓“靶向治理”,而是形成一种具有从变革治理行为到变革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综合治理”。

可以预料,这种全球治理是标本兼治的行动方案,是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生态建设各个领域的纵深变革,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新时代,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并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对此,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正确的路径是,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处超越文明优越。

## “美好生活需要”与美丽中国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方能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8000 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比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少,而且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以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被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出现。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重要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中国人正在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迈进。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建设,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特征,新就新在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就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就新在党要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而引领承载着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的提法会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新特征呢?这存在理论、思想以及日常生活话语方面的认知因素。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伦理学”的误读。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说成“物质利益决定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同时,还有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现象。这两种观点不能说对中国学者没有丝毫影响。

其实,恩格斯有先见之明,他在 1890 年 9 月 21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

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而对于所谓“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现象,列宁曾明确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给我们加上的一个罪名。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呼吁。譬如,马克思本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这方面的众多理论阐述,还有待于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新。

其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中,存在一种“GDP 主义”和“一手硬一手软”的误导。

当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民生短板、治理体系和文明水平等。其中,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特性相结合的认识因素,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抓经济建设与抓环境保护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雾霾、食品安全、饮用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在此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正在转化为全国上下的自觉行动。

最后,对人们未来愿景的追求中,存在一种“商品拜物教”和“理想信念淡化”的误区。

应当指出,人们在批判金钱和“市场万能”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积极维护理想。哲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时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推向极端,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次要地位。人们高消费的热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出现了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法兰克福学派还尖锐地批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造就了人性的危机。在广告的世界里,异性的青睐、社会成功、事业成就乃至人生的幸福,似乎都不必通过诚实、品格和艰辛工作取得。有鉴于此,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

对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是不是更需要弘扬艰苦奋斗、勤俭治家的优良传统?是不是更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健康的生活、生产方式?这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课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

## 中华传统文化要有扬弃地继承

■ 谷宇 高奇琦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强调的许多观念都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和平思想,实际上在《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等典籍里能够找到出处。再如,强调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观念与《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儒家“节用而爱人”等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是有生命的,若要生生不息,需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以时代发展为背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不是说要去机械“复制”古代的典籍,而是要把典籍中的内容与时代性结合起来。同时,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即把真正优秀的内容加以创造性利用,而不是简单地传统形式移植到当代。换言之,我们要认真地真地对传统文化展开去伪存真的工作。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传统文化中关于强调学习、热爱和平、绿色生态、互相帮助等“正能量”传统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予以深入挖掘,并结合时代要求加以扬弃。

服务大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需建立在文化自信和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需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服务于发展大局,并要对意识形态安全起到支撑作用。

服务人民。文化是人民思想状态的体现,也是人民的创造性活动。要深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激发人民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从根本上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好创造与创新的目标和要求。要坚持古为今用、以鉴今的态度,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的原则,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让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当代文化有机统一起来。

(作者分别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 “虚实”商业能否形成联动效应

■ 曹伟遐 耿昊奇

“双 11”期间,对很多人来说,主题是“买买买”。时至今日,互联网已经渗透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支撑现代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Wi-Fi、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逐渐将人们引入“万物互联”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享有贴合于自我内心需求的消费体验,而无需穿梭在拥挤的人群,费力找寻向往的物件。

时代潮流之中,人们开始关心实体商业的未来:实体商业是否将走进历史?实体商业设施是否会成为历史遗迹?

### 实体和网络“鸿沟”在缩小

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商城为人们创造了一种无处不在、随心所欲、度身定制的购物体验。但是,所谓“眼见为实”,人们敢于在网上下单购物,大多基于过去的消费经验。试想,在网上搜索商品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件商品从各方面都满足你的需要,但这个商品从未在实体店见过,也缺乏值得信任的用户体验报告,你敢立即下单吗?可见,实体商业的消费经验是网络商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基础,是人们作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

理性来看,尽管已经有不少产品开始直接通过网上渠道销售,但多限于被消费者广泛认知、价格相对实惠、差异性较小的商品。即便各类“网红”产品,除了吸引匹配度极高的小众消费者,也是名气大于实质。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店铺租赁费用、存货占款、销售人员薪酬等经营成本影响,销售价格通常高于网上售价。为此,相关厂商纷纷投入电商战略,并获得了一定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很大程度上依旧得益于之前在传统渠道积累的良好口碑。

从更深层次而言,在相互排斥的表象之下,实体商业与网络商业之间的“鸿沟”正逐渐缩小。二者关系在本质上其实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正是在这种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面向新消费的 O2O(线上营销、线上购买带动线下经营、线下消费)形式应运而生。

以小众需求调动大众需要

对于新消费,业内给出了多种不同的提法:有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统零售相结合为核心的“新零售”概念,也有以零售基础设施完善而带来成本、效率、体验提升的“第四次零售革命”概念。无论哪种解读,都预示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消费时代。

在这个新消费时代,人们足不出户便可通过外卖平台订购知名餐饮店提供的美食,从各种网购平台买到几乎所有的商品;如果对网上服务不放心,还可以通过点评类客户端予以了解和调查;如果要出行,则能通过打车软件来预约专车;距离较近的,还可以骑上共享单车前往。这一切消费都没有必要动用银行实体卡,而只需通过在线支付工具就能轻松完成结算。点点滴滴的改变,让实体经济与虚拟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融合于一体,其焦点落在了“人”的身上。

新消费时代,一切的商业活动都将围绕人展开,人的需求是推动商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横向上,厂商应充分洞察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挖掘“利基市场”(通常指市场绝对优势企业所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空间;纵向上,应该以人为中心,注重全供应整合。以零售市场为例,要以小众的需求调动大众的需要,推动人、货、场融合的“新零售”模式。

“云雾计算”挖掘真实需求

以人为中心的融合发展环境中,实体商业和网络商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乃至成为完整的一体。如果把这个生态系统抽象出来,便构成商业街区、社区商业网点、互联网电子商务三位一体、高度融合的新型商业生态环境。它们为消费者从各个角度提供全方位的消费体验。

第一,商业街区融合创新,为消费者提

供新的现场体验。由于消费习惯的变化,一些传统商业街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显著下降。但在高度融合的商业环境中,商业街区将成为创新产品的展示场所,第一时间把最新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帮助他们提供全新体验。全面融入网络环境的商业街区还可以应用多种手段,包括虚拟现实技术,切实增强技术等,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例如,一些实体店书店把书香、茶香、咖啡香一起融入门店环境中,打造“书香门第”的立体体验。真切消费体验提升了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感,为相关产品的品牌效应提供了保证,推动了网上销售的纵深发展。

第二,互联网与传统商业跨界融合,有助于挖掘和培育消费者的新消费需求。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完成商品交易,海量数据分布于网上各个角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遇。将数据上传至云平台,继而应用人工智能分析相关数据,可深入分析消费者的最新消费意愿,为产品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动力。此外,将各种应用程序分布于网络边缘,在生产数据的网络程序本地进行数据操作和分析,这种称为“雾计算”的概念则为实体商业街区部署消费者体验设施并分析体验成效提供技术保障。无论是“云计算”还是“雾计算”,都能动态挖掘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第三,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社区商业网点升级。遍布于社区的超市、便利店、书吧乃至各式餐厅在满足消费者日常需求的同时,还能利用靠近消费侧的优势成为物流网络的重要节点。例如,菜鸟驿站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快递的投递距离,在尽可能不影响消费者取件便利性的条件下提高了物流效率。未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社区商业网点有望成为一个个消费行为传感器,为持续改善商业网络提供佐力。

总之,在新消费时代,网络商业不会完全取代实体商业,而会成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共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多渠道、全方位、高品质的体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市轻工业科技情报研究所工程师)

从应急管理转向风险防控

日前,第三届浦江城市治理创新论坛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超大型城市风险防控学术研讨会举行。与会者呼吁,新时期的城市风险防控需从应急管理转向风险防控。

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指出,新时代的安全管理应该有工作评价、事故问责、民众安全感等新要求。就完善上海市城市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而言,应着力于一个理念、两个平台、三个机制。一个理念指的是居安思危,强化风险意识;两个平台是指搭建综合预警平台和健全综合管理平台;三个机制即指通过健全安全风险共治机制、创新精细化风险防控机制和构建多重保障机制来实现多元共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委委员、第三分校校长朱亮高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超大型城市风险防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一是培育社会意识。二是完善责任机制。三是加强能力建设。

本次活动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陈奇星工作室、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和解放日报《思想周刊》共同举办。

(王珍 应敏)



■ 南钢

中国教育学会此前发布调查报告披露,2016 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 1.37 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 700 万至 850 万人。但是,教育培训市场也存在不少由来已久的问题。特别是,办学的利益至上、招生的虚假广告、内容的超前教学、流程的名不符实、形式的即时快乐、机构的鱼龙混杂等乱象,严重干扰了教育培训市场的正常运行,玷污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良好形象,背离了教育培训的初衷。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认真对账的。

具体来看,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要做到支持与规范并行、鼓励与约束并行、发展与治理并重,要以共建共享的思维去构建教育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框架体系,最终形成教育培训市场的良性治理格局。为此,应当做到三个结合:

首先,制度设计和行业规范相结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培训机构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缺乏相关制度和行业规范。这直接导致社会培训机构的参差不齐和培训市场的鱼龙混杂,为此亟需完善制度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完善教育培训市场综合治理的制度规范,包括方针、政策、法律和规定等。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 2011 年 1 月正式通过《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并颁布实施《上海市教育培训机构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暂行规定》及《补充规定》《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登记暂行办法》和《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但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培训市场发展的需要,有待进一步加强行业规范,应鼓励那些优质、高效且富有创新活力和良好社会声誉的教育培训机构组建行业联盟,积极把握教育培训行业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研究教育培训行业的标准、制度和规范,明确培训流程,建立行业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完善教育培训行业的评估标准和体系,开展教育培训行业的年度自评。

其次,理性引导和有效监管相结合。以往对于教育培训机构,多是重“管”轻“理”,以至于无法形成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之间的有效互动。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满足了广大人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为个性化教育创造了空间和可能。就此而言,政府和社会应积极鼓励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而不能一味否定和拒绝。但是,积极鼓励并不是放任自流,需要理性引导与有效监管相结合。

理性引导是使教育培训机构在守法规范经营基础上加强自律,努力成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建立多元监管体系,如完善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经费、经营、质量等审查,发布教育培训行业质量年报,建立信用公开和信用等级档案制度等。对社会而言,可建立教育培训行业社会监督管理平台,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网络跟踪等方式,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最后,文化建设和生态培育相结合。教育培训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离不开积极向上的培训文化。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增进文化认同。教育培训市场由于对象多元、类型多样、性质迥异,因而形成了多样的培训文化。这就需要增进文化理解,形成培训行业的文化共识和文化认同。二是推进文化交融。要形成一种具包容性和统摄性、富渗透力和穿越力的培训文化,激活教育培训行业的文化基因,构筑一种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三是培育文化自觉。要充分发挥培训机构的主体性,彰显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

在开展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教育培训市场的良好生态。一方面,对于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应通过品牌战略、市场管理以及与体制内教育机构的联姻,实现孵化拓展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应积极创造优惠条件,鼓励扶持新生创新型培训机构的发展。此外,应积极鼓励教育培训机构内部的良性竞争,努力形成一种积极、规范、有序的竞争格局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应该指出,规范教育培训行业本身不是目的。唯有以治理统领规范,以规范促进发展,不断完善教育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体系,才能促进教育培训行业的绿色、生态和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 理论动态

日前,第三届浦江城市治理创新论坛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超大型城市风险防控学术研讨会举行。与会者呼吁,新时期的城市风险防控需从应急管理转向风险防控。

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指出,新时代的安全管理应该有工作评价、事故问责、民众安全感等新要求。就完善上海市城市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而言,应着力于一个理念、两个平台、三个机制。一个理念指的是居安思危,强化风险意识;两个平台是指搭建综合预警平台和健全综合管理平台;三个机制即指通过健全安全风险共治机制、创新精细化风险防控机制和构建多重保障机制来实现多元共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委委员、第三分校校长朱亮高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超大型城市风险防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一是培育社会意识。二是完善责任机制。三是加强能力建设。

本次活动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陈奇星工作室、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和解放日报《思想周刊》共同举办。

(王珍 应敏)

规范培训机构既要「管」也要「理」